



# 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推进历程

○ 蒋光贵

[摘要] 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总结的历史经验, 特别集中体现在三个历史决议中。这三个历史决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则从确立和初步阐述、恢复和发展到紧密结合并得到全面融合而又深入具体发展的历史进程, 这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关键词] 历史决议;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时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sup>①</sup>在党的历史上, 已经通过了三个总结历史经验的决议, 一个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个是1981年6月27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三个就是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三个决议的形成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则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得到确立和初步阐述

党的历史上的三个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成果。可以说, 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就没有这三个决议。

到1945年春,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年的历程, 其中, 曾经经历过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 在广大农村掀起土地革命, 革命根据地曾经发展到十几块。但是, 由于“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革命力量遭到重大削弱, 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这24年来, 中国共产党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然而,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大革命失败后, 将革命的中心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 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面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了坚决的斗争。1930年5月,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就强调“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 离开调查研究, “不是机会主义, 便是盲动主义”。他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正确的, 是需要学习的, 但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照搬“本本”。到达陕北后,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10月14日,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与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才发挥出“伟大的力量”, 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讲马克思主义, 就会流于空洞抽象。他还强调, 这个问题,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 强调“理论和实际统一”。1942年2月1日,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科



学解释了何为真正的理论家，他说，真正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所有这些，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的基础。这个《决议》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深刻分析了党内错误尤其是三次“左”倾错误的表现、原因和危害。正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整风运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历史决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是在全党形成并确认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基础上形成的。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起草的。没有这个集体，不可能形成这个《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sup>②</sup>

第二，它是在全党对右倾和“左”倾错误有了深刻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有了正确认识，尤其是对教条主义的来源、表现、危害和纠正的办法有了深刻的认识。

第三，它是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形成的。这个成熟，一是指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成熟，二是指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即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正确的深刻的认识，这是这个《决议》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个《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sup>③</sup>。《决议》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sup>④</sup>。

第四，它是在全党思想统一、达到空前团结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个《决议》指出：经过24年的历程，“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sup>⑤</sup>。

第五，它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是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有了成熟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全党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这个《决议》指出：全党思想和行动上的

空前团结统一，“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sup>⑥</sup>。历史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则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不但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同时，也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一些弊端，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以苏联为借鉴，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要走。他还指出，我们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1966年5月以前，虽然党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在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但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主要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我们党偏离了八大路线。邓小平同志后来说过，过去我们有不少教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当时“两个凡是”的束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根据时代和中国的实际，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点。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失误。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灵魂和指导意义。这极大地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极大地维护了党的形象，避免了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从而引起信仰危机的错误做法。同时，《决议》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深刻分析了其发生的原因，总结了教训。《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点也做了初步的归纳。所有这些，对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对于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旗帜鲜

明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概念。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已成熟。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个历史决议重点在拨乱反正，与此同时，也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这个《决议》是在反对“两个凡是”，在全党倡导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做出的。

第二，这个《决议》是在党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改革开放初步展开并取得一些成就的情况下形成的。

第三，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形成的。

第四，这个《决议》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同时也指出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及其性质。它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样做，既肯定了党的历史，也有利于改革开放。

第五，它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挫折。《决议》特别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过程和教训做了深入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初步认识。《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sup>⑦</sup>《决议》对这条正确道路的内容总结为十个方面，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中心任务的规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

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等。《决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则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统一起来，并且得到全面深入推进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走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当今中国处在从改革开放以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时期，虽然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但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却发生了变化，一些老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新问题又相继产生。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长期执政能力，需要勇于自我革命。在这种时候，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sup>⑧</sup>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上、在经济建设上、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在政治建设上、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在文化建设上、在社会建设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在外交工作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些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则的更加自觉运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在以下条件下形成的：

第一，它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形成的。历史证明，有了坚强的领导集体，才能对历史经验做出科学的总结。“两个核心”的确立，是党和人民的愿望和选择，是新时代的需要。

第二，它是在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长期稳定两大奇迹”<sup>⑨</sup>，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条件下形成的。

第三，它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胜利，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形成的，是距离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越来越近的条件下形成的。



第四，它是在积累了党的百年历史经验、七十多年执政经验、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决议》是在形成了“伟大的历史主动性精神”，在强调“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认识的情况下形成的。

第五，它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科学体系的情况下形成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发展为“十个明确”，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有了思想理论保证。

第六，它是在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不断强调初心和使命的情况下形成的。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责任担当。《决议》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sup>⑩</sup>在新时代强调党的宗旨意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概括起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突出特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有机统一：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因此，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此为源泉的精神谱系。针对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标签化、边缘化等错误倾向，习近平高瞻远瞩，深刻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sup>⑪</sup>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但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个别结论区别开来，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议》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sup>⑫</sup>

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的“十个明确”中，党的领导是放在首位的。这不但从逻辑上讲得通，而且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突出的重要问

题。百年党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以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自身的建设紧密统一起来。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统一起来的极端重要性。《决议》突出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强调了“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是以往的《决议》所没有强调的。《决议》最后部分专门讲“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求全党明确国情、主要矛盾、任务，而且对党自身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出了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党更加成熟。

三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决议》指出，虽然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sup>⑬</sup>，但是，我们要充分看到实现目标任务的艰巨性，清醒认识当前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前进。这里，十九届六中全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性质、宗旨、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和优势等有机统一起来了。

四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道路紧密结合起来。《决议》总结了百年党的历史经验，其中，第四条“坚持独立自主”和第五条“坚持中国道路”，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统一起来。《决议》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sup>⑭</sup>《决议》深化了对这条道路依据的认识，指出，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符合中国国情”，这样，就使我们“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从而就具有了“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sup>⑮</sup>。

五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特别关注时代的变化。在党的十九大上，我们党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sup>⑯</sup>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要根据时代“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sup>⑰</sup>。随着时代、实践以及科学的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会向前发展，随

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会走向深入。我们要“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sup>⑮</sup>。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所以如此显著,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十分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上,党的认识更加深刻:第一,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这是我们分析其他问题的前提。第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明确中心任务。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就为新时代的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习近平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sup>⑯</sup>。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我们反对的只是“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sup>⑰</sup>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新时代如何在实践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与实践的结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中都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党和国家最深厚的根基。这就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实践性统一起来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党的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条,其中,第二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sup>⑱</sup>这就告诉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只要我们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形成最大的同心圆,一定能够发展巩固我们的党,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六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也是贯彻这“两个结合”的。毛泽东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sup>⑲</sup>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将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看作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之一,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将这种要求当作“党性的表现”<sup>⑳</sup>。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深刻作用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在继承中向前发展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面对世界的深刻变化,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认识已经非常自觉了。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这“两个结合”,这在党的重要文献中还是第一次强调,反映了党中央对第二个“结合”的高度自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提出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意义:它是我们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sup>㉑</sup>。在这个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文化软实力。

在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有了多方面发展:第一,充分认识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国家兴衰存亡。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如果丢了这个根,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就容易出现民族分裂、国家灭亡。我们能否坚定文化自信,是关系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第二,充分认识到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sup>㉒</sup>。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结果,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是最高层面的东西,是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所坚持的理论、所建立的制度的核心和灵魂。第三,深刻认识到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sup>㉓</sup>。这种认知,至少包括以下基本的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就

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sup>⑩</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血脉”“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理论中都渗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对“小康”社会的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继承了我国优秀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整体推进，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党的建设进程中，都继承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法治资源。

####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②③④⑤⑥②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952、953、998—999、999、801页。

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⑧⑪⑬⑮⑲⑲⑲⑲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

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66、66、66、349、351页。

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60、67、63、67、64、64、67、65、61、62、47页。

㉔《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矫海霞）



扫描二维码 听主编点评

